

●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最终成果 ●

● 中山大学“985工程”创新基地项目阶段成果 ●

Education Service Product Theory

# 教育服务产品理论

李江帆 主编

研究

Research

Research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最终成果
- 中山大学“985工程”创新基地项目阶段成果

Education Service Product Theory

# 教育服务产品理论

李江帆 主编

研究

Research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服务产品理论研究/李江帆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306 - 03231 - 7

I. 教… II. 李… III. 教育—产业—服务质量—质量管理—研究—中国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932 号

---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张礼凤

责任编辑: 张礼凤 杨 捷

封面设计: 贾 萌

责任校对: 杨 捷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mm × 960 mm 1/16 35 印张 57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定 价: 69.00 元

---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导 言

本书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产业与教育服务产品理论研究”（批准号：DFA010209）的最终研究成果和中山大学“985 工程”服务经济与管理创新研究项目的阶段研究成果。

教育产业与教育服务产品问题是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教育的理论研究涉及面较广，总体来说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教育学层面，运用教育学相关原理分析教育现象，揭示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二是经济学层面，运用产业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教育部门的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律，以促进教育服务业的发展。

在中国，对教育的产业属性长期存在两方面的认识偏差。一种偏差是否定教育是产业，把教育看成是只消耗财富、不创造财富的“非生产部门”，教育不计成本，不讲效率，教育服务价值补偿机制不完善，使教育陷入教育效率低、质量低、发展水平低以致萎缩再生产的困境。另一种偏差是把教育产业当做盈利性企业的同义词，把教育“产业化”误解为教育市场化，把学校办成见钱眼开的“趋利动物”。这两种认识偏差都影响了中国教育健康发展。因此，全面认识教育部门的产业属性，系统分析教育部门的产品及其经济属性，以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是学术界面临的新任务。

本书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教育产业与教育服务产品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它运用第三产业经济学原理，以服务产品理论和服务“四环节”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教育服务产品在教育产业领域的运动为主线，分析教育服务业的产业性质和教育产品的属性。全书由 10 章组成，系统研究了教育产业热点问题、国内外对教育产业的探讨、教育服务产品的成本、作业成本法在教育服务业中的应用、中国教育服务产品成本补偿机制、教育服务产品需求与供给、教育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中国教育投入产出效率、中国

居民教育消费、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等问题。

浏览全书可以发现，本书对教育服务业和教育产品的研究分析有三个明显特色：

一是以服务产品理论作为教育产业分析的理论基础。国外对教育产业的理论研究主要运用教育经济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筛选假设理论、社会化理论、国家论等，其中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偏重教育的个人收益和教育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为典型，较少涉及教育服务产品与教育产业的属性和教育的整体运行机制的理论层面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在教育产业化、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和教育投资等方面的非系统的研究。本书以服务产品理论和服务“四环节”理论为理论基础，全面系统分析了教育服务产品的属性和教育产业运行机制，力图为垒实教育经济学基础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是从服务“四环节”的大视野对教育产业作综合性很强的分析。以往学者大多从教育学角度研究教育规律，即使研究教育经济问题，其视野也多局限于生产或消费环节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对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联系往往难以全面顾及。本书则从经济学出发，运用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环节”的大视野剖析教育服务产品呈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揭示在教育服务领域发生作用的、与教育规律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的经济规律，力求提出对我国教育产业健康发展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对策。全书研究选题围绕教育服务产品“四环节”的视野展开：教育服务产品和教育产业研究、教育服务产品的成本研究、中国教育服务产品成本补偿机制研究、作业成本法在教育服务业中的应用研究，分析的主要是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问题；教育服务产品需求与供给研究，主要分析教育服务产品的流通问题；教育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分析、中国居民教育消费研究，主要分析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问题；中国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研究，综合分析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问题。综合分析有利于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性，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教育服务业的发展现状、问题，得出符合实际的对策。

三是在运用多种方法确定中国教育服务业的质和量的规定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教育服务业发展对策。本书结合国内外教育产业发展历

史、现状和趋势，在广泛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工具和 EXCEL、SPSS、EViews、LOTUS 等定量分析软件，对教育产业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例如，在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研究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调查法、国际比较法、相关分析法等。研究教育费用攀升时，在论证教育服务产品需求增长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根据统计资料分析中国教育费用大幅度攀升及其原因。在教育产业关联与波及研究时，使用投入产业分析方法，借助 EXCEL 和 LOTUS 等软件进行定量分析。在教育消费研究时，以相关数据为依据作国际比较，求出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并作协整检验。在高等教育扩招研究时，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时，运用教育服务产品理论对教育投入、产出的共性和个性进行分析，并运用相关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我国教育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对教育消费的研究就是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提出正确发展对策的一个实例。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从支出结构看教育消费，系统地描绘城市和教育支出的变化率，借用基于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计算城市和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引入政策变量，衡量政府的价格机制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并判断影响力度的大小，在国际国内比较研究基础上导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和建议。中国教育费用持续攀升、教育服务产品的成本、教育服务产品成本补偿机制、作业成本法应用、教育服务产品供求管理、教育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居民教育消费、高等教育扩招的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如果说对中国教育服务业发展不是陷于“空对空”的层次，而是具有切中时弊的实践稟性的话，那也是因为它经历了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的“两次飞跃”。

比较分析现有教育产业论著的内容和观点可以发现，本书通过中外数据的系统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新结论和新观点。具体地说，这些新观点和新结论体现在如下 11 个方面：

1. 教育产品是包括教育服务消费品和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在内的教育服务产品，而不是人才。

教育服务消费品是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用于培养、提高和改善人的智力素质的非实物劳动成果。它包括教师的备课、讲课、辅导、批改作业等一系列

“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服务。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是指现代社会的企事业、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部门，为进行实物产品或服务产品的生产，以公费支付学费的方式向外购买对在编员工进行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教育培训服务，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脱产培训，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训，委托培养、定向培养或出国培训等。享受公费支付学费的员工消费的教育服务产品，作为一种软生产资料和中间消耗投入学费支付单位的生产过程，能通过提高员工素质大大改善生产的主观条件，成为促进现代生产产出增多、效益提高的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第三产业因存在着大量智力密集型行业，对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消费水平比较高，第二产业其次，第一产业对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消费微乎其微，需要改善。

教育部门的产品是人才的观点，从一般意义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不严密的。它混淆了教育服务产品本身与教育服务产品的消费后果。首先，从“产品一般”的属性来看，产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是与产生需要的主体——人相区别而存在的。将人视为产品，就将消费的主体和客体混为一谈了。其次，产品就其使用价值可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作为需要主体的劳动力本身既不能划为生产资料也不能划为消费资料，因而在功能上与产品并无共同之处。再次，从国内生产总值看，如人才是教育产品，就必须把人才统计进国内生产总值，这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最后，从教育的供求关系看，作为需方的学生支付学费为的是购买教育服务，而不是购买作为人才的学生自己。

2. 教育产业是以人财物资源的投入为代价提供教育产品产出的部门，是生产教育服务产品的部门和单位的集合，而不是盈利性企业的同义词。

近年来国内教育界存在着一个较普遍的误解，就是把“产业”当做盈利性企业来理解，把“产业化”误为市场化，然后以此误解为基础，对教育产业和产业化表示赞成或反对，甚至提出“教育是产业，但教育不能产业化”之类似是而非的观点。从形式逻辑来看，“教育是产业，但教育不能产业化”的观点是逻辑混乱的命题：前一判断“教育是产业”命题的意思是“所有教育（部门）都是产业”，而后一判断“教育不能产业化”命题的意思是“所有教育（部门）都不能转变成产业”，这就出现了“所有教育部门都是产业，但所有教育部门都不能转变成产业”的荒谬的、互相矛盾的判断。现代产业体系包括无形产业，现代产品包括无形产品，教育业作为

产业体系中生产服务产品的部门，本身就是产业部门，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不存在由非产业转变为产业即“产业化”的问题。将教育产业化理解成教育市场化，只承认市场化的教育是产业，否定“吃皇粮”的教育是产业，是错误的。承认教育是产业，并不意味着教育的市场化，不是也不应该取消非盈利教育服务业，一窝蜂地把全部教育单位都推向市场。把教育产业化误读为教育市场化，然后以此误解为基础批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成了与唐·吉柯克的风车作战。

3. 教育服务产品的成本分析表明，中国教育服务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员工成本上涨决定的，高等教育存在着规模不经济，教育投入结构效益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负担比例过低，对高等教育的负担比例过高，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教育成本。

通过现有教育经费统计资料对教育服务产品的成本进行计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和成本分析发现：

(1) 中国教育服务产品成本的上升是由员工成本的快速上涨决定的。各级教育中，小学教育成本上升最为显著，原因在于小学的生均员工成本上升较快。高等教育成本与中学、小学教育成本相比偏高。就高等教育成本构成而言，也与生均总成本以及小学、中学的教育成本构成反差极大，在其成本构成中，员工成本并没有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其他经常性成本比例偏大。

(2) 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用购买力平价折算成可比价后的高等教育的生均固定资产折旧高于日本和美国。应充分地利用高等教育中现存的规模经济，降低教育服务产品的成本。

(3) 中国教育服务业学生与教职工之比、专任教师与教职工之比较低。合理配置教育业的人力资源，通过后勤社会化等途径实现减员增效是降低生均员工成本并最终降低生均总成本的有效途径。

(4) 用适者生存法对高校最优规模的分析发现，高校的最优规模应为5000人及以上。2000年中国只有34.2%的高校达到这一规模。但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在达到这一规模的高校中也并不是都实现了预期的规模经济。高校规模的最优化水平应以生均成本的降低和成本-效益的提高为标准，追求适度规模。

(5) 中国教育的投入结构效益偏低。中国教育经费的分配没有遵循教

育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而呈现金字塔形和纺锤结构,对生均经费与人均GDP的比例分析也显示,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过大,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基础教育的投入。

(6) 中国对义务教育的负担比例与国际相比明显过低,对高等教育的负担比例过高。成本负担的不公平现象已凸显。政府应是基础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对高等教育应采取成本分担主体多元化。

4. 中国教育服务产品成本补偿机制研究表明,中国教育成本在财政补偿、非财政补偿和配套机制方面都存在问题,应加大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把农村义务教育成本补偿的重心上移至省级,根据居民支付能力和教育成本制定学费标准,激励社会捐赠,延长教育贷款还款期,以降低学生还贷负担。

中国教育服务产品成本补偿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①财政补偿方面:中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一直较低,教育投入整体上与中国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义务教育成本补偿机制中政府补偿份额明显偏低,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义务教育投入新机制实行后,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地区差异反而有所扩大。②非财政补偿方面:农村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限,高校校办产业盈利能力和获得捐赠能力均弱,校办产业对经费的贡献份额日益萎缩,而高校捐赠份额一直非常小。③配套机制方面:贷款难、还贷难、不平衡现象存在。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建议有:①中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持续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偏低。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建立完善的税收体系。②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地区差异,包括新机制实行以来教育经费地区差异,是由分权化的成本补偿机制造成的。可借鉴美国义务教育补偿机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成本补偿的重心继续上移至省级。③中国学费标准的制定未能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教育成本有较强的相关性。应在制定学费标准时加强对居民支付能力以及教育成本的考虑。④中国税收激励不足导致了社会捐赠不发达,建议加大免税额度以激励社会捐赠。⑤中国贷款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还款负担,但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应进一步延长还款期限,以降低学生还款负担,促进贷款机制的健康发展。

5. 应该将作业成本法运用到教育服务业成本核算中去,提高教育的资源使用效率。

作业成本法依据产品消耗的各种作业量和单位作业量分摊的间接费用确定的间接成本的合理分摊,为学校等组织进行成本管理及产品价格决策提供了更为精确的信息,使组织处于更积极主动的境地。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思想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核心程序在于选择作业与成本动因。学校教育作业成本分为主体作业成本和辅助作业成本,辅助作业成本按照成本动因分配到主体作业,按照“确定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归集各作业成本、选择作业成本动因、将作业成本按照成本动因分配到产品中”四个主要步骤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教育服务业成本核算中,初步形成了教育服务业作业成本核算新架构。将作业成本法用于中国学校教育成本核算有利于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和办学效益。

6. 中国教育服务价格不断提高导致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义务教育投入机制需要完善。

消费结构升级趋势、高学历化趋势、望子成龙期望和企业人力资源素质要求使教育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上升。根据对近 20 年来消费结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教育支出在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中国居民教育费用的大幅度攀升主要是教育价格的提高引起的。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服务产品从总体上说属于非自动化服务产品、教育服务需求坚挺、教育投入的多元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当然,阐述教育服务价格上升有其客观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赞成教育服务脱离服务价值漫天要价。

面对教育费用上升的形势,政府应该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应开辟奖学金、勤工俭学、教学贷款、社会赞助等多种渠道,资助高素质人才接受高层次教育。与此相关的是义务教育投入机制需要完善。修订《义务教育法》,重点应是完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具体地说,首先,举办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应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由各级政府共同分担,非义务教育由政府、社会、个人分担的机制。其次,在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重点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资责任,改变当前两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比例过低及中国义务教育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缩小全国义务教育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最后,国家要制定义务教育最低财政标准,对低于财政标准的县乡,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自上而下地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制度给予财政支持,增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全国义务

教育的宏观调控能力。

7. 要有效进行教育服务产品的供求管理,满足各类教育服务需求,提高教育服务质量与办学效益。

教育服务需求按需求主体不同,分为个人教育需求、企业教育需求和国家教育需求三种类型。中国个人教育服务需求具有迫切性、自主性、多元化、总量旺、不平衡性、潜力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价格因素。制约教育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财力和个人(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建议采取需求管理的具体政策措施是:①在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大国家教育投资以满足各级教育需求,特别是加大义务教育投资。②针对教育价格(费用)不断上涨,政府应采取最高限价、费用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进行调控。坚决反对和制止以“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和其他名义进行的种种不合理收费与乱收费。③针对教育发展不平衡性,政府在坚持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基础上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关心支持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及城乡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④进一步发展多元化筹资和开放的办学体制,不断完善“奖(奖学金)、贷(贷学金)、助(勤工助学)、减(减免部分学杂费)、补(困难补助)”制度。⑤针对第一、第二产业对教育服务产品生产消费水平偏低,应建立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的继续教育(培训)投入机制,加强企业和农村人才培养。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调整优化办学层次结构,不断提高教育服务质量。

教育服务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教育服务价格、教育资源、劳动力需求结构、教育的单位成本、教育体制和政策、社会对教育的认识 and 态度等。当前中国教育服务供给的现状与主要问题是:供给量虽逐年增加但仍然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分布不平衡,学校内部存在着众多影响教育供给的问题。应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外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建立起以政府办学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办学体系,进一步增加教育服务供给,特别是优质教育服务供给;坚持市场需求和基础研究并重,调整优化办学层次与科类专业结构;进一步深化学校内部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机制创新。

8. 教育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与波及分析表明,中国教育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偏重对教育业硬件的投入,对其上游产业带动能力较大,对国民经济

的推动力大于经济发达国家，受到国民经济的拉动力小于经济发达国家，应主动发展教育服务业，增大教育业软件投入，通过发展教育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

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业产业关联与波及的相似点有：①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对教育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都非常低，说明教育服务业是以提供生活服务为主的产业。②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对教育服务业的直接消耗量由大到小的顺序都依次为第三产业（除教育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说明教育服务业为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相对较多，这与第三产业吸引就业人口比重大、存在着大量智力密集型行业有关。③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教育服务业都属于中间投入小、附加值高、且中间需求率小的最终需求基础产业。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都小于 50%。④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能力都强于受到国民经济的拉动能力，说明如果想通过经济发展后来拉动教育服务业的发展还不如主动发展教育业，在发展教育服务业的同时也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业产业关联与波及的不同点有：①中国教育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份额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教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偏低。因此，中国应积极发展教育业，增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增加值比重。②中国教育服务业对其上游产业的总体带动能力强于经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教育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明显大于经济发达国家，所以发展教育服务业对其上游产业的带动能力相应也会较大。③中国教育服务业发展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投入，经济发达国家则主要依赖第三产业的投入。这说明中国教育服务业目前还处在数量扩张阶段，偏重对教育业硬件的投入，而发达国家主要偏重对教育业软件的投入。④中国教育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能力大于经济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教育服务业的影响力和影响力系数均大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发展教育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能力将大于经济发达国家。⑤中国教育服务业受到国民经济的拉动能力小于经济发达国家。因为中国教育服务业的感应度和感应度系数均小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对其教育业应采取主动发展战略，而不是等国民经济发展后再拉动其发展。

对中国教育服务业产业关联与波及特点的分析提供的启示是：主动发展教育服务业，增大教育服务业对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即对软件投入的需求。中国应在确保教育投入总量不断增加时，加快对其软件

方面的投入,提高其社会化程度。通过发展教育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

9. 对中国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大学和小学应努力改变规模不当状况,中学要重点提高管理水平以提高效率,要加大教育投入总量,缩小生均教育投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状况。

运用服务产品理论对教育投入、教育产出的特性分析以及对中国各级教育的各种前沿效率和传统的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是:

(1) 教育的投入产出特性:教育投入的特性体现在:教育投入的人力资源学历和素质都很高,教师投入工作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投入教育的物力资源中固定资产的比例较大,学校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有效运行,教育服务生产者——教师自备部分生产工具;投入教育的财力资源来源具有多样性,教育业的收入全部用于教育的再生产。教育产出的特性体现在:教育产出的教育服务产品,其信息、知识含量高;教育服务产品属于精神型服务产品;教育服务产品质量难以量化;教育服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复杂;教育服务消费者在教育产品生产过程中能动性较高,对教育产出的质量存在一定影响。

(2) 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差别:计算各省各级教育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相对得分值,根据 DEA 投影原理,计算各省要达到相对有效,应投入的资源数量。中国各省高等教育效率差异最小,随着教育级别的降低,各省教育效率差距增大,其中小学效率的差异最大。普通高等教育和小学教育无效率的省份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过低,而普通高中和初中教育无效率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过低。因此,普通高等教育和小学教育应努力改善规模不当的状况,而普通高中和初中则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水平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中国东部的普通高中、普通初中、普通小学教育效率都是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最低的,普通高等教育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西部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中部地区各级教育效率都处于三大地区中间水平,并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基本分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一般、较低的地区,因此三大区域的分析结果也正好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各级教育效率间的关系。

(3) 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班级规模、人均 GDP、政府拨款的比例、女生比例、城市学生比例对教育的效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人口素质对

教育效率存在很小的影响，而找不到证据证明学校规模对教育效率产生了影响。

(4) 教育效率的级别差异：不考虑教育产出的质量时，中国各级教育的生师比都接近 20，高等教育的生师比上升较快，小学教育的生师比下降较快，而高中和初中教育的生师比变化较小。各级教育都在尽量减少非专任教师的比例。中小学每平方米校舍负担的学生数在下降，而高校在上升。消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生均经费，除了小学先下降后上升，其他各级教育都是下降的。各级教育偏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在教育产出质量尝试性折算前后基本相符，但变化幅度小。由于变量选取、折算系数的确定等具有较多的不足之处，得出的计算结果可能并不是中国教育偏要素生产率的完全真实反映。中国中小学生的生师比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高校的生师比已明显比发达国家高。中国没有能力为每个学生投入像发达国家那么多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教育质量。因此，应加大教育投入总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生均教育投入的差距，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教育质量。同时，改变各级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状况，适当向初中、小学倾斜。

10. 对居民教育消费的协整分析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教育经费负担与支付能力不符，不公平现象凸显，教育定价必须坚持能力支付和兼顾公平原则，政府在教育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的作用应该增强。

对中国教育消费和投入的统计性分析与城乡教育支出持续迅速增加的原因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中国的教育投资体制由政府单一投资体制转变为多元化投资体制以来，个人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在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成为了教育投入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 2.4% 左右，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人均教育支出和教育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弹性，或者说以现有的时间序列，无法计算中国城市居民教育消费的收入弹性。1985—2003 年，城市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加不是由收入的增加而是由教育价格不断上涨造成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并未明显加大基本教育方面的消费。这从侧面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教育消费没有受到收入的约束。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纯收入之间、教育支出和教育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比例关系。人均教育支出对人均纯收入变动呈弱弹

性（弹性系数为 0.78），说明在基本教育消费这一环节，农村家庭已经受到了较明显的收入约束。

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教育价格体系：

（1）教育定价必须坚持能力支付和兼顾公平原则。中国居民家庭教育经费负担与支付能力不符，不公平现象凸显。应根据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中能力支付原则提供教育经费，体现教育公平。

（2）提高政府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进一步拓宽经费渠道。在保证现有渠道的基础上，开辟诸如教育税、开设教育银行、发行教育彩票等新的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同时，提高政府在教育经费分担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急需加强政府教育投入，带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3）控制教育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强教育收费监督。教育价格的飞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高等教育价格脱离了广大普通老百姓的现实承受能力。应该控制教育价格的过快增长，确定合理的价格标准，并加强对教育价格的监督，禁止乱收费，实行教育价格公示制度和教育价格听证会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降低大学生个人负担的教育成本比例。

（4）政府在教育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的作用应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维持在 2.4% 左右，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杂费占教育费用的比例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由 1991 年的 4.4% 上升到 2002 年的 16.84%。这说明，政府在教育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的作用一直在下降，政府指定的价格水平引导了居民教育消费的不断攀升，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正常提升和升级。因此，政府在教育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的作用应该加大。

11.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引起高校资源紧张、学费猛长、就业严峻，凸显政府投入不足、贫困生资助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必须通过控制招生规模、构建多元化投资体制、制定合理学费标准、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加强学校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职能来缓解。

中国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原因：①现实选择：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不景气。与此同时，广大居民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强烈。为了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②战略选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积累人力资

本，使扩招政策具有更加长远的战略意义。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带来的问题与矛盾：学生规模过快发展导致高校教育资源供给紧张，不能较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不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扩招加速了学费的迅猛增长，与中国居民的承受能力形成了矛盾。扩招使2003年以来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同时也使政府投入不足、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不健全等相关配套政策不配套的问题凸显出来。

缓解对策：控制招生数量，保证教育质量，使高教招生规模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构建多元化投资体制，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社会捐助。制定合理的学费标准，构建完善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加强学校内部的自身建设。注重教师素质和数量的提高，建立健全高校内部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规章制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政府在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宏观调控职能，保证毕业生就业的实现与资助体系的有效建立及运行。

本书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分析教育服务业与教育服务产品。为明确统计概念和统计口径，特作如下说明：

(1)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指第一产业 (广义农业) 和第二产业 (广义工业) 以外的其他各业。服务业 (service sector)：提供服务的行业。两者外延相同，内涵略有不同 (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对称，强调其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工业对称，偏重其服务性质)，可当做同义词使用。

(2) 教育产业 (education sector)：提供教育服务产品的部门和单位的集合，也称教育服务业、教育业，外延等于全部教育机构和单位的总和，既包括非盈利性教育事业，也包括盈利性教育企业。

(3) 教育服务产品：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用于培养、提高或改善人的智力素质的非实物劳动成果，由教育服务消费品和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组成。教育服务消费品是用于生活消费的教育服务产品。居民自费支付的教育服务属教育服务消费品。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是用于生产消费的教育服务产品。企事业、机关、团体公务所需的、以公费支付的教育培训服务，属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

(4) 统计数字的时效性：每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刊登的是上年统计数据，分省数据通常滞后1年，而中国数据和国际数据通常滞后2

年或2年以上。《中国统计年鉴2006》是本书定稿时所能得到的官方最新统计数据，2005年分省数据则是本书所能得到的最新数据。

诚挚欢迎关心中国教育发展的读者，特别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管理人员，一起关注教育服务业与教育服务产品研究，共同促进中国教育服务业的发展。